

中国早期
现代化中的
传播媒介

序 一

近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对历史人物、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等的研究均有所建树。七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对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重新界定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入，导致了对整个中国近代发展线索认识上的突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它包括以近代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即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洋务派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西学东渐”的新型文化刚才起步，对于民主政治尚未触及，且对19世纪八十年代后掀起的民主思潮起阻挠作用。历史表明，变专制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宣传工作，历史地落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肩上。学术界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较为重大的新的成果。

应该指明，有关近代化方面的研究还有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比如，以往史学界研究社会思潮多侧重于思想认识的形成及内涵分析，忽略了对新思想的传播及社会影响的深入研究，这就有失偏颇。以《校邠庐抗议》为例，冯桂芬在一八六一

年就写成该书，他在书中列出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专题，撰写成文，这类专文在当时是首见，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该书并未及时出版发行，其崭新的思想内容也就不可能为广大民众所知晓。该书直至一八八三年才付梓，时距成书已有22年。因此，我们在估价社会思潮的形成及影响时不能仅看它提出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看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即要分析各种新思想传播的现状及民众的接受程度。闾小波博士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提出以传播学为观点，运用历史学与大众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众传播媒介，以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来阐述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对此，我极力加以鼓励，希望他能攻克难关，写出一部填补学术界空白的博士论文。

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盛衰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好似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一样。在一八九四年前，从总体上看国人尚未认识到域外新知的重要性，接受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因而缺乏接受它的热情。这时，即便新知识传来了也不会被民众所普遍接受。只有当人们产生了对新知的渴求，才能理智地、冷静地反思，大众传播媒介才有广阔的市场，并真正发挥着“能动性的倍增器”的作用。但传播媒介的盛衰又不是被动地、机械地依赖于社会环境，传播者（办报人）的创造性、进取性也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就向人们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作者发挥了历史学者治学严谨的学风。全书史料翔实，拾遗补缺，纠谬得实。作者的意图尽管不在于写新闻史或报刊史，但有关《时务报》创办历史，传播内容、出版发行、受众概况、

传播效果等方面所作的细致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份重要报刊的认识，也充实了对变法维新及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如书中对成立京师强学会的质疑、对后期《时务报》“易帜”依附于张之洞所提出的不同看法、对汪康年功过所作的重新评价等，均言之成理，议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这体现了作者不固成说，敏于思考的治学态度和开拓创新精神。

与有着悠久传统的历史学相比，大众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它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大众传播学，使大众传播媒介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还需要有志于建立和发展这门学科的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我殷切地期望闾小波博士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刻苦钻研，百尺竿头。是为序。

夏东元序沪上临渊斋1993年国庆节

序二

商品经济的大潮，势不可挡。面对这股冲击，史学界不能不考虑如何应“变”！有的人顺应时代潮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心，从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入手，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的人热衷于“应用研究”，试图适应“市场”需要，以摆脱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不景气状态；有的人觉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或情绪抵触，或愁肠百结，或听天由命；有的人则坚守阵地，辛勤耕耘，在低谷中奋进，努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学术文化贡献自己的精神产品——我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闾小波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播媒介》，就属于这种类型。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基于振兴中华和超前思考的使命感，先后兴起了“文化热”和“现代化热”。两研究热点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通过专家们沉潜精思的学术论著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广为宣传，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文化变迁包涵着器物——制度——精神三个由浅入深的不同层面，必须从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次，来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加快中国由中

世纪向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进程。

历史和现实反复提出，少数先进分子的理性认识，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台“能动的倍增器”，泛化为更多的物质力量，这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

以往，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从龚自珍、魏源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精英文化和俊杰彦士的文献著作进行分析，很少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系统深入的具体研究；而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又大抵侧重新闻史的角度，就事论事地作描述和评价，未能以观念更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为视角进行探讨。可贵的是，闾小波却能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大众传播学的“五W”模式结合起来，将由国人自办、且对变法维新产生极大影响的《时务报》，置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了《时务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这在学术界尚属首见。可以这样说，通过对《时务报》主笔、撰稿人及传播内容(论说、奏章、译文)的条分缕析，尤其是对“受众”反映和传播效果的具体解剖，闾小波是在研究先进思想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方面，作了具有实证意义的开创性尝试。尽管作者在《前言》中把它称之为“冒险的尝试”，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个“险”，值得“冒”，而且“冒”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评阅博士论文过程中，闾小波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书广征博引，史料翔实，立论有据，深中肯綮。大量附表的浩繁引据，细致考订，拾遗补缺，纠谬得实，更见作者潜心致志，精细抉择，披沙简金，积腋成裘的苦功，以戊戌时期学会和社团的数量为例：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列出18个学会；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列出36个学会；今人专著多方收罗，列出53个学会；而闾小波经由文献记载、师友

书札、报刊广告、启事、章程、碑文中缜密爬梳，又增补了29个学会和社团，并一一列出了它们的名称、创办人、地点、时间和资料出处。显然，如果没有认真严肃的学风，坐冷板凳的毅力，对历史真实和微观分析的高度重视，是不可能取得上述研究成果的。

看到青年学者茁壮成长，我感到由衷喜悦。获悉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决定雪中送炭，给这本书以出版资助，我更感到兴奋。当然，闾小波的博士论文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听说，他在付印前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我相信，在学术征途上，闾小波一定能精益求精，不断奋进。

任重而道远。愿与作者共勉！

李华兴

1993年12月22日

前　　言

本书将自鸦片战争以来朝野所推行的社会变革称之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迟缓，这是一个最富有挑战性而又最诱人的重大课题。早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官绅就开始探索其缘由，当今，更有众多的中外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倾注大量的心血进行不懈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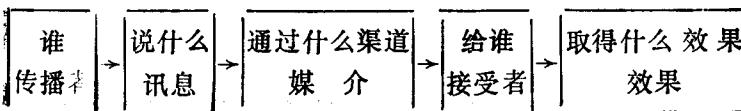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甚少。当今现代化理论及传播学理论均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倍增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率。在中国，《时务报》之于变法维新、《新民丛报》之于立宪运动、《民报》之于辛亥革命、《新青年》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导》之于国民革命等，均为显证。

本书研究《时务报》，不是在写报刊史或新闻史，而将其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较为显赫的大众传播媒介，探讨其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传播媒介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有着自身特殊的规律，

学者们将对这一规律的探索归之于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兴起。它一问世就吸引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的注意和兴趣。二次大战后，这一学科在西方日趋成熟。其发展之快，俨然成为一大显学。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所提出的“五W”模式。他将大众传播视为一个过程：



对“五W”的研究相应称之为控制研究(传播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同时，也要注意到对传播讯息的具体环境和传播者意图的研究^①。本书主要从上面这几个方面来研究《时务报》。

探讨《时务报》这一近一个世纪前的传播媒介，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这不仅需要对《时务报》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条件、史料等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考证，纠谬得实，且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用这两种方法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播媒介是一种冒险的尝试。因为这不仅需要挖掘大量的史料，还需要研究者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维，对我来说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深知其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三年来在导师夏东元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大胆鼓励下，我牢记入学之初先生的教诲：“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所未发，发人之所不敢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发。”从阅读大量相关的资料和理论书籍入手，进行不懈的探索。其间既有欢乐的感受，也有受挫的困惑。探得一种新的观点，无不感到欣喜；碰到一大堆难题，又令我心躁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心境中完成了这篇尚不成熟的博士论文。我深知文中的阐述和观点有诸多不当之处，祈望同行师友和读者匡正。

目 录

序一	夏东元
序二	李华兴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遗产：滞后的传播媒介与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缓进	1
第一节 传统社会·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	1
第二节 一八六一年前《海国图志》的出版及受众	4
第三节 官方的译书及传播	8
第四节 同文书会对西学的传播	11
第五节 报刊的发行及受众	14
第六节 国人著作出版延宕、传播不畅	18
第七节 滞后的舆论准备与社会变革的缓进	22
第二章 甲午战争后《时务报》应运而生	28
第一节 《马关条约》令普天忠愤	28
第二节 “三会”“三报”——维新派制造舆论的尝试	35
第三节 从杨崇伊弹劾强学书局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	46
第四节 应运而生的《时务报》	51

第三章 《时务报》概说	53
第一节 宗旨、性质、停刊	53
第二节 著、译者	59
第三节 稿源	67
第四节 周期、版式和栏目	70
第五节 《时务报》馆的附属事业	72
第四章 《时务报》的财务与出版发行	77
第一节 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及官绅的捐款	77
第二节 收入与支出	80
第三节 销售网点	83
第四节 发行量及地区分布	87
第五节 官员对《时务报》的“奖许”	92
第六节 《时务报》馆出版及代售的书刊	95
第五章 传播内容分析之一：论说	101
第一节 论说的作者、篇目、文体及说理方式	101
第二节 变法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109
第三节 革故鼎新的自强策	112
第四节 师法日本 抵御强俄	120
第五节 检讨中国传统文化	123
第六章 传播内容分析二：奏章	127
第一节 文化教育类的奏章	127
第二节 工商矿务类的奏章	134
第三节 铁路船政类的奏章	140
第四节 银行币制邮政类的奏章	143
第五节 练兵及改武科类的奏章	145
第六节 中外约章及外国典章	148
第七章 传播内容分析之三：译文	152

第一节 外国对华评论和报道	152
第二节 外国对华政策	158
第三节 对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详尽报道	161
第四节 输入西方文明	166
第五节 各殖民地的现状	171
第八章 受众研究	176
第一节 盛况空前的《时务报》热	176
第二节 受众的人数、构成及地区分布	178
第三节 受众对传播内容及主笔的评价	186
第四节 受众对传播效果的评判	198
第九章 传播效果研究之一：《时务报》与政治变革	202
第一节 对变法维新的重新界定：变法维新 I、II	202
第二节 《时务报》与变法维新 I	204
第三节 《时务报》与变法维新 II	206
第十章 传播效果研究之二：《时务报》与文化变革	222
第一节 官绅价值取向的转变	222
第二节 社会习俗的变革	234
第三节 文化市场的巨变	241
结语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时务报》	253
各章的表格	
第一章 表一：同文书会受众测算表	13
表二：甲午前主要报刊一览表	15
第二章 表一：一八九五年维新派创立的三个学会	36
表二：上海强学会主要成员一览表	41
表三：一八九五年维新派创办的“三报”	43
表四：一八九四年前港、沪报刊数比较	48
第三章 表一：《时务报》馆的主笔	60

第二章	表二: 《时务报》馆的译者	60
	表三: 《时务报》论说的主要投稿者	61
	表四: 《时务报》译文的投稿者	63
	表五: 《时务报》上笔名与本名对照表	63
	表六: 《时务报》上署名正误表	65
	表七: 《时务报》出版情况一览表	70
第四章	表一: 《时务报》馆在各处的代收捐款者	78
	表二: 《时务报》馆收到的捐款简表	79
	表三: 《时务报》的收支简表	81
	表四: 《时务报》的各项收入及所占比例	82
	表五: 《时务报》的各项支出及所占比例	82
	表六: 《时务报》代销点的地区分布	84
	表七: 《时务报》的印刷数	87
	表八: 《时务报》在湖南的销售情况	90
	表九: 《时务报》馆对各省代销点的寄报数	91
	表十: 衍令购阅《时务报》的官员名录	93
	表十一: 《时务报》馆出版的著作及译著	96
	表十二: 《时务报》馆及各代派处代售的书刊	97
第五章	表一: 汪康年所著论说一览表	103
	表二: 麦孟华、徐勤、欧榘甲所著的论说一览表	105
	表三: 章太炎、郑孝胥等人所著的论说一览表	106
第七章	表一: 各通商口岸外国官员的商情报告	155
第八章	表一: 江苏各府《时务报》的代销数	185
	表二: 受众对《时务报》所作的总的正面评价	187
	表三: 受众对梁启超所作的肯定评价	191
	表四: 受众对汪康年所作的肯定评价	193
	表五: 受众对《时务报》传播效果的评判	198

第九章	表一：“百日维新”的发动者及策划者与《时务报》 的关系	210
	表二：“百日维新”期间《时务报》的受众递呈的 奏折	212
	表三：光绪的新政“上谕”与《时务报》的变法主张 对照表	215
第十章	表一：变法维新时期成员较多的社团	230
	表二：变法维新时期学会的分布	230
	表三：变法维新时期学会及社团补遗	231
	表四：上海戒缠足会董事的地区分布表	236
	表五：变法维新时期出版的大型时务书籍	245
	表六：广学会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八年销售收入 表	250
附录	征引、参考书目举要	258
鸣	谢	263

第一章 历史遗产：滞后的传播媒介 与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缓进

第一节 传统社会·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

本书的视角是大众传播媒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焦点放在《时务报》与清末的变法维新上。历史的演进虽纷繁多姿，但毕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时间的连续性。考察《时务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历史地位，有必要对历史遗产——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甲午战争以前)中的传播媒介作一番梳理和分析。

现代化理论将历史进程通常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一般具有下列这些典型特征：“农业和渔业在经济中居支配地位；相对来说职业不够分化；没有机械化技术；相对来说产品很少以市场为取向；文盲程度很高或识字率非常有限；公共舆论对个人的行为起着突出的主导作用；普遍的一致信仰；初级原始的行政机器；普遍地接受权威；身份地位主要由身世决定；生物性血统作为决定个人认同的准绳占据突出的地位；科层制的盲从心理；巫术信仰和宗教信仰无孔不入；很少提出改变资源和报酬分配的要求；很少提出提高收入和地位的积极要求；对现在的收入和地位没有显著的不

满；很少有意识地促进社会变迁。”^①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一般包含着这种假设：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变化不大，而且所发生那种变化主要是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迁。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所作的这些描述大致适用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尽管中国传统社会还有许多自身的特征，如科举取士、无世袭的贵族阶层及文化传统上的特殊性等。

“现代化”实是一个古老过程的新名词。说它是一个古老过程指的是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特定的时空内每一个社会都面临着现代化的课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因时制宜。说它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欧洲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高速变迁的过程。“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②。现代化虽然是指一个过程，但它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或标准，如：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较高程度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社会成员大范围内的相互交流；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广泛普及文化知识；一个延展和渗透的大众传播系统等^③。完全具备这些标准当然是指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

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如果着眼于西方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碰撞与交流，现代化的始点应在十九世纪之初；如果从内部实际作出的反应着眼，则在该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

① (美)E·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第3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美)E·布萊克著，景跃进等译：《现代化的动力》，第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美)西里尔·布萊克著：《比较现代化》。转引自钱乘旦等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